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

欧阳雪梅

摘 要: 毛泽东毕生重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应当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使之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把握和吸纳,是成功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与基础;他注意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治国理政的智慧;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挖掘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放在第二位,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有关;应该吸取他晚年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放松警惕的教训。

关键词: 毛泽东;传统文化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DOI:10.14130/j.cnki.mzr.2015.02.003

关于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者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大多数肯定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也不乏一些诸如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渊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化”、“儒家化”,毛泽东对孔子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等简单化或绝对化的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与重视,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和再思考,在这样的情境下,在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分析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很有意义。

一 毛泽东毕生重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之广泛,研究之深入,认识之独到,为世人所公认。他在私塾读四书五经,也读《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中国古代小说。1911年,毛泽东离开家乡到省城长沙求学,广泛涉猎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读赫

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卢梭的《民约论》等西方著作,大大开阔了视野,但仍然推崇国学。他主张“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①1916年2月21日,他为学友萧子升开了一个国学书目,其中“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②。毛泽东身体力行,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只要能找到的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在陕北延安,更是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发奋读书。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除了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也非常重视研究传统文化,尤其注意从古代哲学中发掘唯物论和辩证法等优秀成分。他托人买了《孙子兵法》、两套《中国历史通俗演义》。1936年,斯诺在采访毛泽东后得出的看法是:他“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③。

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更好的读书条件,20多年里,毛泽东阅读和收藏了大量书籍。1988年开始

作者简介:欧阳雪梅,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③[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5页。

的毛泽东藏书整理工作,统计藏书总数为96473册^①。类别从马列经典到文史典籍,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囊括古今中外,纵横经史子集,涉及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文艺、历史、地理、科技、宗教等领域。关于阅读情况,在1950年冬至1966年夏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的逢先知先生说“毛泽东读书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②晚年的毛泽东,视力减退了,但追求知识的欲望丝毫不见低落。1975年,毛泽东还在读《晋书》,患眼疾时请北京大学的卢荻为他读《水浒传》。他向图书管理人员要的最后一本书是《容斋随笔》,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③。这是他在延安时就读过的一部书。

毛泽东读书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匡时济世”,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哲学是文化的思想核心,中国传统哲学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为求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主张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学习重点放在修身、哲学等方面。20世纪30年代末和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问题,他也重点读哲学方面的书。有据可查的,他读过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④。

中国自古以来强调史学的资政治国的功能。毛泽东对此类书籍兴趣很浓,用功很深,藏书中历史书籍占了很大比重,1952年购进的清乾隆武英殿版的线装本《二十四史》最醒目。这部记载了中国从黄帝时代到明朝崇祯十七年长达4000多年历史的浩瀚长卷,有850册、3700多万字。他不仅通读了全书,而且对很多章节反复读了多遍,留下大量的批注、圈划和评语。1996年影印出版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达13万页,为认识中国的历史和

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此外,他还通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等。1954年冬,毛泽东与吴晗谈起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来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⑤即他研究历史是以史为鉴、把握规律、汲取智慧。1939年1月,毛泽东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⑥

毛泽东对古代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他喜爱曹操、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作和柳宗元的散文,研读《楚辞》,背诵《昭明文选》的一些散文,反复读谈《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使他拥有罕见的古典文学素养^⑦,对各家作品有独到的评论。1958年3月,他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15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47首,明代杨基、杨慎等12人写的18首,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8日他曾借阅楹联书10余种,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还有孙髯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达180字的对联。毛泽东对这幅长联甚为赞赏,能背诵如流。清人梁章巨在《楹联丛话》中,认为此联“究未免冗长之讥也”,他颇不以为然,写道“从古未有,另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⑧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这说明毛泽东读文艺作品有进德修业、陶冶性情以及欣赏消遣之效用。

“毛泽东对于古书内容的研究和理解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许多方面实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就是在近代的革命家中,都

①王刚《领袖风范——回忆毛泽东同志藏书和文稿整理保管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4日。

②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13页。

③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页。

④陈晋《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光明日报》2014年1月17日。

⑤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

⑦陈晋《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光明日报》2014年1月17日。

⑧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页。

是不多见的”^①。他不仅批判地汲取其丰富的思想营养,而且影响他的文风文采,为创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

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中西文化关系中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二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近代以来,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激烈,存在着“全盘西化”与复古两种倾向。毛泽东深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不同于五四时期许多文化人的绝对化态度。他在1920年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②这表明他以辩证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主张,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作为民族的文化,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明确反对全盘西化,强调外来文化只有与中华民族特性相结合,才能有生命力。

毛泽东对凝聚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持科学的、历史的态度。五四时期,他尖锐批判中国旧思想、新道德,但不盲目反传统文化。如1917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批判“三纲”思想。1919年7月21日,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论及“自由讨论学术”时,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弊端指出“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③。同年,他就长沙发生的新娘赵五贞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自杀事件,一连在报刊发表9篇论文和杂感,抨击封建礼教和万恶的社会。而在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的信和1917年4月《新青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他提出改造继承孔子提出的“智、仁与勇”三达德^④,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贯穿他一生。他尊重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在《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9月1日)中,他将“孔子问题”列为研究问题之一。1920年春,在第二次由北京取道上海

回长沙的途中,他下火车到曲阜拜谒孔子故里和坟墓,凭吊这位伟人。1937年10月19日,他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⑤《孔子评传》作者匡亚明曾在1942年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毛泽东表示“孔子生在两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两千多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東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⑥他肯定孔子创办私学普及教育的功绩,但也批评孔子的轻视生产劳动的缺点。这反映了毛泽东对孔子一分为二的态度。他说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倡导墨子朴素的劳动观念。

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毛泽东一直持这一观点。1953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⑦1958年8月16日,在审阅陆定一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时,他增写了一段文字,对历史人物——点评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的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⑧

毛泽东从建设新文化的角度,强调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不是赞扬

①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2页。

② 《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68页。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⑥ 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74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3页。

⑧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页。

任何封建的毒素”^①。1960年12月,他进一步提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②。他对这个原则有深入的阐述。首先,封建时代的文化,也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也有非封建乃至反封建的。所以,我们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分开来。其次,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分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③。再次,封建时代的思想家所概括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固然主要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道德要求,具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它的某些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应当遵循的规则,是可以批判地加以利用的。比如,父慈子孝是孔夫子提倡的。而我们也“还要提倡父慈子孝”,当然,这样做,并不是无条件的^④。同时,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这一点也是不应当被忽略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思想及思想方法展开研究与梳理。1939年,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写了有关墨子、老子、孔子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就孔子的“正名”理论、“过犹不及”、“中庸”中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孔子主张一切从名出发,由名到实,这颠倒了客观实在与精神的关系,“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孔子的“正名”中有合理、积极的因素,“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长处应该说到”^⑤。对孔子的“中庸”思想,他引申出在政治生活和革命实践中都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防止和克服“过”与“不及”的错误,“过犹不及”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毛泽东认为孔子的哲学思想

从总体上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但含有片面真理,有辩证法的因素^⑥。1943年,针对“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的观点时指出“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⑦。

毛泽东主张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具体的分析,弄清楚从中需要吸取什么、摒弃什么,改造什么,这样才能正确地对它进行批判的继承,使之成为新文化建设的养料。他认为,继承决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推陈出新”,即继承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改造并用新的实践经验重新诠释,或注入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实现文化创新。他说“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⑧从而明确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总起来说,毛泽东对待中国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科学地利用,使之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封建复古主义。为利用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后,标点《二十四史》,修订《辞海》、《辞源》,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等都出自毛泽东的建议。他提出要分门别类地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中国古典著作,并重新出版。

三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把握和吸纳,是毛泽东成功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与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涵养了毛泽东的道德情操、精神追求、文化旨趣和人生价值,是影响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因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毛泽东的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发生在湖湘文化的氛围中。他深受湘人匡救时弊、坚忍不拔、克己唯严、身体力行的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湖南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产生了诸如屈原、王夫之、魏源、谭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5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5-116页。

⑤《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1、133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4页。

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页。

嗣同、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禹之谟、刘道一
等一大批爱国和革命的志士。毛泽东对他们十分
景仰,很爱读他们的著作。他抄录屈原的《离骚》、
《九歌》,访问过玉笥山屈原的故居,深为屈原宁折
不弯、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高尚品德和爱国情怀所
感动。他常去长沙小吴门的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
说及事迹,佩服船山之大节及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批
判精神;和蔡和森等常在岳麓山上禹之谟墓前徘徊
逗留;感慨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慷慨悲歌、
舍身报国精神。他指出“我觉得湖南人确有几种
可爱的特性:坚苦、奋发、勇敢、团结、同心都是。”^①
1915年他发出征友启事,求“刻苦耐劳、意志坚定、
随时准备为国捐躯”^②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湖湘文
化培养了毛泽东高远的志向、伟大的追求,铸造了
毛泽东的文化性格,这是他成为一个坚强、坚韧的
马克思主义者的基因。

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较早地感悟到中国几千
年积淀下来的传统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特征
是值得重视的国情的一部分。1926年,他在广州
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
儒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
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因为洪秀全的手段错
了。”^③他看到了传统思想对农民的影响,中国的农
民革命不能离开传统,需要借助传统为手段以实现
预期的目标。1927年,毛泽东所写《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对农村的文化状况、农民的态度有深
入的调查研究。因此,在他领导建立的革命根据
地,为宣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借鉴和利用了传统
的艺术资源“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风格,便于群
众参与的简便娱乐方式,包括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
样式,一开始便成为毛泽东倡导的新型文化的基本
品格”^④。

毛泽东最先觉悟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
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
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⑤,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

须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前
期,党内存在着一种游离于中国自身历史条件以及
文化传统之外的教条主义倾向,一部分同志“对于
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
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⑥,“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
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
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这
些都是极坏的作风”^⑦。尤其是自诩为“百分之百
的布尔什维克”的王明掌握中国革命领导权后,推
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教条主义几乎葬送了中
国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根本上讲就是把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融为一
体,内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我们信奉马克思
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
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
千真万确的”^⑧。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属于
一种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要想成为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指导思想,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就必须同中国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解
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具有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完
成文化的融合与转化,即要把它融于中国文化并使
之在中国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就必须实
现一种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毛泽东担负起了这
个使命。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
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
务,强调“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
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从孔夫子到孙中
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
产”^⑨。这一思想在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取得共识。
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代表中央向全会作组织
工作报告时说,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
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使组织工作中国化”^⑩。

①张素华等编著《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

②《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③李鹏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

④陈晋《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⑧《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⑩《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26页。

时称中共中央理论三杰的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带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梳理、研究传统文化。之后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结合起来”。并明确“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①。

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中国革命带出了困境,而且,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使他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为例,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常被称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一系列带有西方文化特点的范畴体系。中国哲学包含有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如从古代孔子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孙中山,每一代哲人都探究知行问题,争论是知难还是行难,王阳明开创性地提出了“知行合一”论。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指出,思维具有能动性,同时思维又受物质的限制,思维从社会实践中发生,同时又能动地指导实践。这种辩证的“知行合一”论,彻底克服了唯心论。他讲的知行,不再是抽象的“理”、“道”,而是讲如何知,如何行,完全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谈知和行的关系,阐明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形成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论^③。这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扬弃。又如“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是儒家认识论的方法论之一。毛泽东对这一哲学思想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实事”就是指事情的本来原貌,“求”是指研究,而“是”则是事物的规律性。“实事求是”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党性。实事求是反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的根本和精髓,人们一提实事求是,知道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把中国古代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为人民军队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

久战》等著作中,他不仅直接引用了《孙子兵法》、《老子》等著作中富有辩证法思想的名言,而且对战争过程中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战略与战术、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前进与后退、得与失、胜与负等等相互关系的分析,贯串着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融通。毛泽东特别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实践活动中的方法论问题,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两点论、两条腿走路、“解剖麻雀”和开现场会等,使哲学真正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使哲学从玄学中变成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

毛泽东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深度挖掘和继承发展,运用其思想资源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另一方面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研究人民的需求与心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要素、文化特性、价值标准、行为准则、言语表达等密切结合在一起,通俗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经过他“很好的加工和发挥,变成为广大中国劳苦大众所熟悉的、喜闻乐见的、可以接受的东西了”^④,从形式到内容皆真正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许多人是通过听毛泽东的讲话和读毛泽东著作开始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中国扎下根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文化自觉,也是文化自信的过程。“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⑤。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也促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化”、“儒家化”,完全是无稽之谈。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319页。

②张素华等编著《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③张素华等编著《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许全兴《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光明日报》1983年12月19日。

④张素华等编著《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23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5页。

毛泽东领导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历史文化三者的有机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命名,正是肯定了他的这一伟大贡献。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地继承也得到外国学者的肯定。美国学者斯图加特·施拉姆说“马克思主义被领袖自觉的‘中国化’给群众,同时,它还被领袖们用自己的领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自觉的‘中国化’给自己。”^①

四 毛泽东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治国理政的智慧

毛泽东注意挖掘传统文化中民主性、人民性思想。他重视挖掘农民起义中民主、平等思想。他常看包括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②他对《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的情形不满意。他读白居易《琵琶行》的评语是“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③他对《聊斋志异》中的《小谢》评论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④

发源于上古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石。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对后世留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的训诫。孟子的“民贵君轻”与“民心”之论,唐代贞观君臣的“君舟民水”,是一直受毛泽东重视的民本思想,并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发展。他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凝聚人民力量,才能使革命胜利,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他始终认为,只要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的问题,都是重大的问题;还提出人民民主是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立为共产党的宗旨,并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同时也是治国理政的基石。1944年7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谈到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的来源“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我们曾接受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于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⑥

居安思危,是中国治国安邦古训。毛泽东以史资治,时时警惕。整风运动中,他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学习资料。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不要被不拿枪的敌人打倒。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强调“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⑦。为了防止干部“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号召全党勤俭建国,并严惩了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这体现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历史自觉、使命自觉。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修身,治国之道注重德刑结合。孔子明确提出要“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主张要先德而后刑,德主而刑辅,“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德治是儒家的核心治理理念,并强调任人惟贤,德才兼备。毛泽东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一贯强调在客观实践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他不断提醒并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学习好、掌握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辩证法,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大众的影响,通过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以提升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觉悟,从而构建起了中国人民崭新的思想价值体系,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重

① [美]斯图加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1969年;转引自黄延敏《黄土与红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216页。

②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5页。

③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④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⑥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9页。

⑦ 《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0页。

视言传身教的道德教化作用,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用美德感染、影响大众。他从严要求自己,率先垂范。他确立了任人惟贤的组织路线。毛泽东也重视法制。1912年6月,他写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联系社会现实提出,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必须以法治国。他说“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之善与不善关系到是否“利国福民。”^①新中国建立后,他领导制定宪法,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等等。

五 如何看待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

综上所述,毛泽东提出批判地接受历史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党确立了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航程。但是,当下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毛泽东否定和批判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重视继承的是传统文化形式。从上述四个方面看,显然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儒家的价值追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儒学政治伦理思想中的“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尊贤任能”、“廉政勤政”等理念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儒学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构建的理论基础,古典的儒学是帝王体系支配着的前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三纲”是它的“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体系,毋庸置疑是要否定的。儒家思想是一种历史文化,我们只能把它摆在思想史中去研究,历史地对待,吸收其精华,作为今天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不是照搬整个思想体系。“仁义礼智信”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思想,也经历了从先秦百家争鸣、到两汉儒学的系统论证再到宋明理学形而上学思辨升华的过程。传统文化的思想主体不会超越时代,关键在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必须用现代人的眼光,科学地进行分析、鉴别、采择、消化。当然,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不容易做到。比如“儒家的‘民本’思想从来就不是一个元命题,它与‘君本’是交织一起的,是从属于‘君本’的”^②。从“民本”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用历史唯物论的科学理论赋予其先进的思想内涵。而树

立了科学文化观的毛泽东,在晚年因放松了对传统文化中糟粕的警惕,特别是放松了对个人崇拜的警惕,出现了家长制作风;过分强调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忽视、违背客观规律,出现了急于求成等。儒家思想中重政治伦理,轻经济和自然科学的传统,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传统的小农平均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热衷于穷过渡的重要原因。中国目前还存在长官意志、个人崇拜、公权擅断这些封建元素,仍然是待解决的难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是单一的、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多元互补、彼此渗透,精华和糟粕杂陈的复合文化形态。因此,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传统,利用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来建设中国新文化,但我们不能对传统文化理想化,以为可以解决今天所有的问题,更不能把腐朽当神奇,把糟粕当做国粹。

毛泽东强调批判性也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有关。中国近代以来处在“革命的震荡”时期,与近代人民革命和文化转型的要求相适应,重点批判维护封建社会的专制皇权和等级制度服务的旧意识形态和伦理原则,而近代以来儒学又总是被政治上保守甚至反动的势力所利用,所以,谴责尊孔读经或提倡旧礼教、旧思想,破旧立新成为主流,挖掘传统文化中思想资源是第二位的。

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不完全是一个文化问题,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为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旧思想、旧文化的主要代表受到批判。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表示不赞成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尊儒反法”。1971年“9·13”事件后,毛泽东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得知林彪将孔孟言论奉为座右铭,便提出批孔问题。1973年7月,他指出,林彪尊儒反法,同国民党一样^③。8月5日,毛泽东同江青谈话,谈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时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主张法治,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还念了新写的一首诗《七律·读〈封建论〉》^④——呈郭老》。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

①《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②张清俐《洞察中国古代历史的王权主义本质——访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刘泽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7日。

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页。

④《封建论》是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字子厚)的史论文章,阐发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主张。

犹在,孔学名高实批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7日,《人民日报》发表得到毛泽东肯定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在“四人帮”的推动下,批孔运动开始。“孔学名高实批糠”这一结论,抹杀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种全盘否定的评价同他以往一贯的看法大相径庭,也违背了他提倡的一分为二地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方法论原则。毛泽东批孔的着眼点是针对当时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做法的倾向,把孔子看成是保守、倒退、复辟的代名词,试图通过批孔批判当时社会中的所谓“右倾”、“保守”、“倒退”、“复辟”思潮,来肯定和维护“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全盘反对传统文化对民族文化造成了难以平复的创伤,应该全面否定,但不能因此得出毛泽东反传统的结论,应根据他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作全面、科学、历史的分析。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在传统文化观上正确的方面是主流,是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的道路,并成为一代杰出领袖和文化大师。他浸润着传统文化的语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他那些文字优美、内容丰富、说理透辟、气势磅礴、熔铸民族文化与个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诗篇,不仅吸引并熏陶了几代中国人,而且享誉世界。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跨越大西洋来中国访问,见到毛泽东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读了您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您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②毛泽东的著作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和先进文化的视窗和桥梁。

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上升,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对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根源性问题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③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提出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体现了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继承与扬弃、坚守与创新的辩证思维,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拓宽了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为新形势下如何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路径。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④我们应该铭记毛泽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建设的贡献,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也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着眼于对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挖掘中国历史文化精华,吸收各种优秀文化,兼收并蓄,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思想、新经验,实现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责任编辑:马纯红)

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页。

②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③《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9—100页。

④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